

“要对大时代有大关怀”

——曹沛霖先生二三事

唐亚林

“蓬山万里有归路，老凤指点解迷津。”曹沛霖先生今年92岁了，智者仁寿者。1998年9月到2001年6月，我跟随曹师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一晃有二十六七年了，不论是博士毕业后我曾短暂回到安徽合肥工作，还是调入华东理工大学工作，再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先生的知识教诲、睿智建议、善意批评，一直伴随着我的个人成长与职业生涯发展。

“我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

曹沛霖先生从工作到退休，在复旦大学共执教了五十多年。他在接受学校记者采访时，很自豪地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

上了五十多年的课，从来不迟到，看上去也没有多大神奇的地方，可对于中年两地奔波、老年事务繁忙的曹沛霖先生来说，还是实打实不容易的事情。曹师的爱人早年在苏州工作，孩子也在苏州读书，曹师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在上海和苏州之间来回奔波。那时的交通不像如今这么便利，出个城要做很多准备，换很多车。一旦遇到车次取消或者交通特别拥堵的情形，不要说迟到，就连能不能正常上班都很困难。“上课不迟到”，在曹师这里是一件顶要紧的事情，已变成了对认真教书的一种信念，容不得半点马虎。

1995年曹师63岁的时候，出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那时整个国家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大转型的时期，学校与系所都比较好，作为一个系的“当家人”，既要忙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忙学科建设，又要忙教职工的职称晋升与福利改善事务，还要忙校系两级的日常行政事务以及国际政治系政治学、行政学与国际政治三大专业在全国的声誉。在此种情形下，能保证正堂上课，且上课从来不迟到，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我们读博士时期，曹师还坚持给我们上一门博士生主干课《比较政治》。曹师上课不仅不迟到，而且还坚持站着给我们讲课。曹师讲课条理分明，逻辑缜密，思路开阔，新意迭出，将所讲内容稍做整理一下，就是关于某一个论题的一篇文章。我上课时做了



曹沛霖先生在书房

比较详实的记录，到自己工作后讲同样课程的相关专题时，还时不时拿出来参考。曹师的教学中，就有人从从头到尾做了完整的听课笔记。后来，曹师的几个学生将这些听课笔记和相关文章、著作中的重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构成了《制度的逻辑》一书的雏形。

“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学生们”

曹沛霖先生这代学人，有个特点，就是早年经历了各种政治风雨，中年以后因为学科建设需要，做了大量的案头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隐性埋名

的工作，到了大规模重建一度遭到停课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时候，所做的重点工作还是放在教书育人上，而现在人们普遍看重的个人著述发表事务倒是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进而形成了这代真有学问的学人普遍的“述而不作”的特色。

曹师曾说过一句话，能够代表他的真实想法：“我们是站在别人肩膀上来的，我也希望学生们能踏着我的肩膀上去。”在我们读博士时，他就鼓励我们把把他的一些独立思考写出来发表，甚至认为学生将老师的观点发扬光大，算不上是剽窃行为，因为学术是一代又一代学人薪火相传的事业。在如今特别强

调尊重知识产权且文科思想独创不易的时代，曹师的这种观点有点另类，这也说明了真本领域的学人实际上是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的。也正因为记住了曹师的这句话，我如今经常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上将一些前沿思考和个人观点先发出来，目的也是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和学习，将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变成一个没有围墙没有门槛的开放的大学课堂。

因为我喜欢将日常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发在微信朋友圈，曹师读后，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发一两张或好几张写在纸上的感想的照片给我，一方面是鼓励我多写多发，让他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是谈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并对我的一些观点进行评点，作为师生间的相互探讨。去年我在应约撰写一篇关于党和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问题的文章时，由于此论题很是宏大，有些方面也吃不准，我这个“老学生”就写了一个写作提纲发给曹师指正。很快，曹师发来了他的修改建议，并特别提醒我要注意“现代政治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转逻辑问题”。

对“六人问题”的洞察

学人做学问，有三种境界：一种是有知识的外层境界，即拥有某一专业领域比较细致完备的知识，但缺乏知识转化与理论对话的意愿与能力，固守所谓的“专业门槛”不前，甚至走向了自娱自乐的境地；一种是有学问的中层境界，表现为对本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并将其与历史、现实连接起来，既成一家之言又具释人感之功；再一种是有智慧的高层境界，体现在对人性、人命、人生、

人口、人世、人心“六人问题”的深刻洞察，是将知识、学问、工作、生活与人情事理、世道人心有机结合的体现。这种学问的智慧之道，非经岁月的风霜、生活的磨砺和政治的变幻而不得。无疑，曹沛霖先生是将知识、学问和智慧三者有机结合的学人典范。

记得博士入学后不久的一个冬日，我到凉城新村去看望曹老师和师母。师母给我冲了一杯当时比较流行的速溶咖啡，闻起来香喷喷的。我坐在曹师家朝南的书房里，曹师拉来一把椅子，和我对面坐着，师生俩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因为我在省级党校工作过，对中层政治有一定的了解，在听了曹师介绍当时中层干部的心理与实际状况时，曹师很严肃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亚林，腐败如果走向了体制化，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曹师对国家发展、执政党使命和人民群众命运的关怀溢于言表。如今，执政党通过自我革命以及人民监督的结合，找到了反腐败的利器，开创了国家繁荣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新境界。当年阳光打在脸上、师生对谈的画面，至今依然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沛霖先生是国内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的权威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较政府体制》的研究与出版，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制度》的编写与出版，再到21世纪初的《比较政治制度》一书的集成式写作与出版，都体现了他对比较政治制度领域的深刻洞察与卓越见解。2018年，在《比较政治制度》一书重印了几十次、发行了十几万册、使用了十几年后，由我负责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我通读全书，深感当初曹师拟定《比较政治制

度》一书的写作提纲以及审定全书的内容时所拥有的洞察大势的眼光、冷静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与深谋远虑的格局，以及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原理提炼、制度分析、理论反思等重大理论与现实判断，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验证。正因为曹师对中西政治制度的实质、脉络与框架进行过全面深入的考察和比较，他对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的短缺与磨损、政治制度的实践模式与特征、政治制度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等重大问题便有了清晰、系统和前瞻的思考，这种思考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宝贵财富。

“要对大时代有大关怀”，是曹师在课堂上的谆谆教诲。新世纪来临之际，他专门撰文谈中国政治学“走向科学、走向实际、走向世界”的问题，吹响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号角。如今，我国各门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成燎原之势，也再次印证了曹师二十多年前的睿智眼光和深邃思考。

【人物小传】

曹沛霖生于1933年，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合作经济系读本科，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继续学习，1954年毕业，赴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后在1964年成立的国际政治系任教，直至荣休。

曹沛霖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主研比较政治与中国政治，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点的创始人。他提出了“行政集权民主制”“道德集权民主制”“政治知识化”等标识性概念，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论原理以及“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精神）”“制度短缺与磨损”“政府职能的分化逻辑”等有精妙分析，代表作主要有《制度的逻辑》《比较政治制度》《议会政治》《比较政府体制》等，主持翻译了阿尔蒙德等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因“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曹沛霖荣膺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8-2019）“学术贡献奖”。

晚清著名同光体诗人袁昶，我的桐庐老乡，博学多才，他自21岁中举后开始写日记，现存洋洋六十五册，二百多万字，是晚清文史的重要文献。袁昶日记涉及传统经史诸学，尤其专注于易学、理学、佛学、道学、养生、医方等，这里择几则与读者共赏析。

夜间失眠的时候，袁昶常会背诵《论语》以自娱。

失眠的时候干什么最有效？各说各有理。有人数羊，常常数到几百，几个几百，几十个几百，草原上已经有无数的羊群了，依然没有睡着。

《论语》二十篇，五百章，一万九千余字，古人启蒙的时候，都是必读必背教材，那种死记硬背，不断地背，就会烙在脑子里。要想有效果，就得半睡半醒间也能背，否则越背越用脑子，会越来越清醒。

不过，袁昶也承认，年长以后，事情多多，即便背书，也没有小时候的效果，很少有全文背诵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颜之推早就告诫他的子孙：二十岁以前读的书，六十岁也不会忘记。他们强调的是童子功。

光绪九年（1883）正月，袁昶记下了新年第一天的一则日记：

司马温公曰：吾生平无过人者，惟做事无不可对人对人言耳。

对司马光的这句名言，也有这样的表述：吾无过人者，但生平所为，未尝不可对人对人言。

敲重点：此事可对人对人言否？十年后，光绪十九年（1893），同样是正月，袁昶记下曾国藩的日课：

内养气之法有二：一慎言语。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即温公求诚自妄语始之意，积久自驯，致浸灌浩然。此养义理之气也。一曰节欲。节饮食，每日静坐四刻，数息百入，时时当作养病，此养血气之气也。

说的是自我修养，许多人也以此为标准，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努力践行。

《增广贤文》有格言这样拟：“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这个读书人，虽读遍天下书，但口气依然不小，后一句更牛，不过，这也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要求实在太高。

后来，就演化成固定的七字成语了：事无不可对人言。

细细想来，这一条，如果用来自律，确是极有效果的，每当欲行一切有所不妥当之事，就想一想这一句，这就是警钟了。

1796年5月18日，本杰明·拉什（1745—1813，美国开国元勋）给21岁将赴印度的儿子写信，结尾是这样的：

要保持清醒和警惕。记住，在你见识世界时，世界也在见识着你的本色。更要铭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始终在注视着你。临别之际，我们谆谆赠言，最后还是补充一句：任何时候，若你禁不住诱惑，要行不当之事，请设想父母正跪在你面前，眼含泪水，恳求你抵抗住诱惑，并恳请你明白，若你屈服于诱惑，就是将父母提前送入坟墓。

这与事无不可对人言，异曲同工。

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袁昶的一则读书日记让人耳目一新。

这段时间，袁昶应该是读了平湖陆

袁昶的日记

陆春祥

稼书的书，从而印象深刻：

陆三鱼先生言《战国策》有毒，中而死者，如曹袁悦是也；《庄子》亦有毒，中而死者何晏、邓颺是也。读蒙庄者，去其猖狂妄行乃蹈大方，此类之说，则去毒矣。

这是袁昶的另一种读书方法，求疑法。后者不说，只说前面的陆稼书。

《世说新语》“谗险”第三十二、《晋书》卷七十五都记载了袁悦的事，比如《晋书》这样写：

袁悦之，字元礼，陈郡阳夏人也。父朗，给事中。悦之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阙还都，止贲《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每劝道子专览朝权，道子颇纳其说。俄而见诛。

袁悦也叫袁悦之，他能长短说，就是纵横家，口才自然一流，他拿《战国策》当成唯一的经典，甚至放言，天下只要这本书就够了。会稽王司马道子，是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同母弟。彼时，晋孝武帝为了政权的稳固，牵掣谢安等大臣，对这个弟弟委以重任，司马道子还与谢安的女婿王宝联手，打压谢安等人，后来，司马道子把持了朝政，这又激怒了晋孝武帝，而袁悦之则成了他们争斗的牺牲品。

这样的人，陆稼书则说他中了《战国策》毒，读书读多了，将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而陆稼书自己，真的将《战国策》作了重新解读删节，就是所谓的去毒，编了一本新的《战国策》。

《战国策》，西汉的刘向辑录而成，分十二策，33卷，497篇文章，主要记叙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政治主张及言行策略，许多都是相当有用的计谋，相当于纵横家们的实战手册。个中计谋，不少都演化成固定成语，比如退避三舍、远交近攻、朝秦暮楚、南辕北辙、不翼而飞等，每一个都生动有趣。但如果只将其当作计谋来使用，就会陷入读书的误区，做人做事，并不是只有计谋才行得通的，如果那样，这个社会将会非常可怕。

看袁昶这一节的读书日记，布衣也随手下了一本新的《战国策》，主要是想核一下，哪些被陆稼书作为有毒的章节给删掉了。

无论哪个角度看，读书要去毒的观点，布衣也是一百零一个赞成。

光绪十六年（1890），风和日丽的四月，最是读书好季节，袁昶记下的一个读书观点，对后人显然有些启发。

袁昶的观点是：学作诗文，须玩专集，勿看选本。

按一般理解，专集是博广，选本是专精，读书要博与专相结合，况且，选本是

精华所在，既可以节约时间，又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最主要的东西。

既然提出了“勿看选本”，那就得有足够的理由。

袁昶认为，选本有四种毛病。

毛病一：选本义法固本，却不易学习，容易扰乱人的性灵。为什么呢？凡人的笔力各有天得，虽容易学习却难变化。周敦颐说：性有刚善、柔善、刚恶、柔恶之别，佛家也有人的秉赋有聪明与愚笨的区别，只有写文章的笔法与思路可以通过学习不断得到提高。如果取法太杂，则会限制才气的发挥。

毛病二：选本一般都选一些好的、长的文章，不太好的、短小的文章则会弃之不收，这就好比临摹画画一样，只关注一些表面的皮壳，反而将本真之美掩盖。

毛病三：每个写作者都有一项或几项拿手的文体，比如贾谊、晁错、韩愈擅持论，柳宗元擅序与记，陆贽、欧阳修擅章奏、书尺，苏东坡擅史论，董仲舒、匡衡、刘向擅注经，蔡邕擅碑碣文字，王安石擅序说与哀祭。袁昶说，就是本朝名家，也有方苞擅义理，姚鼐擅义理考据篇章融合，张惠言擅易经，恽敬擅博采众家，一句话，名家也不是擅长所有，而各有侧重，如果才弱而又想兼各家所长，那就很有可能落得下面一样的结局：乌鸦不像乌鸦，喜鹊不像喜鹊，以为是龙却又缺角，以为是蛇却又无脚。

毛病四：看多了选本，这家没学好，又学下一家，移此涉彼，见异屡迁，各家互相打架，枝叶横生。结局往往是，博涉者多如牛毛，精取者却凤毛麟角。

陆布衣觉得，这个话题，现在来说，也是难题。

不少人不专学一家，就是袁昶说的读专集，拆脚式学习，学马尔克斯，学博尔赫斯，学卡尔维诺，学梭罗，皆有所得，有的还成了不小的名家。但也有不少人博采众长，就是袁昶说的读选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就好比吃百家饭，也长得腰肥体壮一样。

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多食杂粮有助于健康。从读书角度看，博与专同样重要。不过，袁昶的重点，显然是就某一个人的作品说的，读全集至少能了解全貌。

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袁昶记下了明人繙续《霏雪录》中关于唐宋诗区别的观点，无论对繙续还是袁昶，都是经年阅读的结果：

唐人诗纯，宋人诗散；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浑成，宋诗纤钉；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燥；唐诗整饬，宋诗散缓；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村富人，蠢服捩人，辞章鄙俗。

唐诗各种好，而对宋诗，用的几乎都

是唐诗反义词。其实，不见得唐诗有这么好，也不见得宋诗有这么差，都是各说各有理，不排除人云亦云，主要还是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不一样。

明代胡应麟《诗数》：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宋人诗如披沙拣金，力多功少。

胡应麟还有点客观，唐诗本真鲜活，如出水芙蓉，给人以浪漫的想法。宋诗用词谨慎，千挑万选，要用合适的字眼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这样评唐宋诗，还有明诗：

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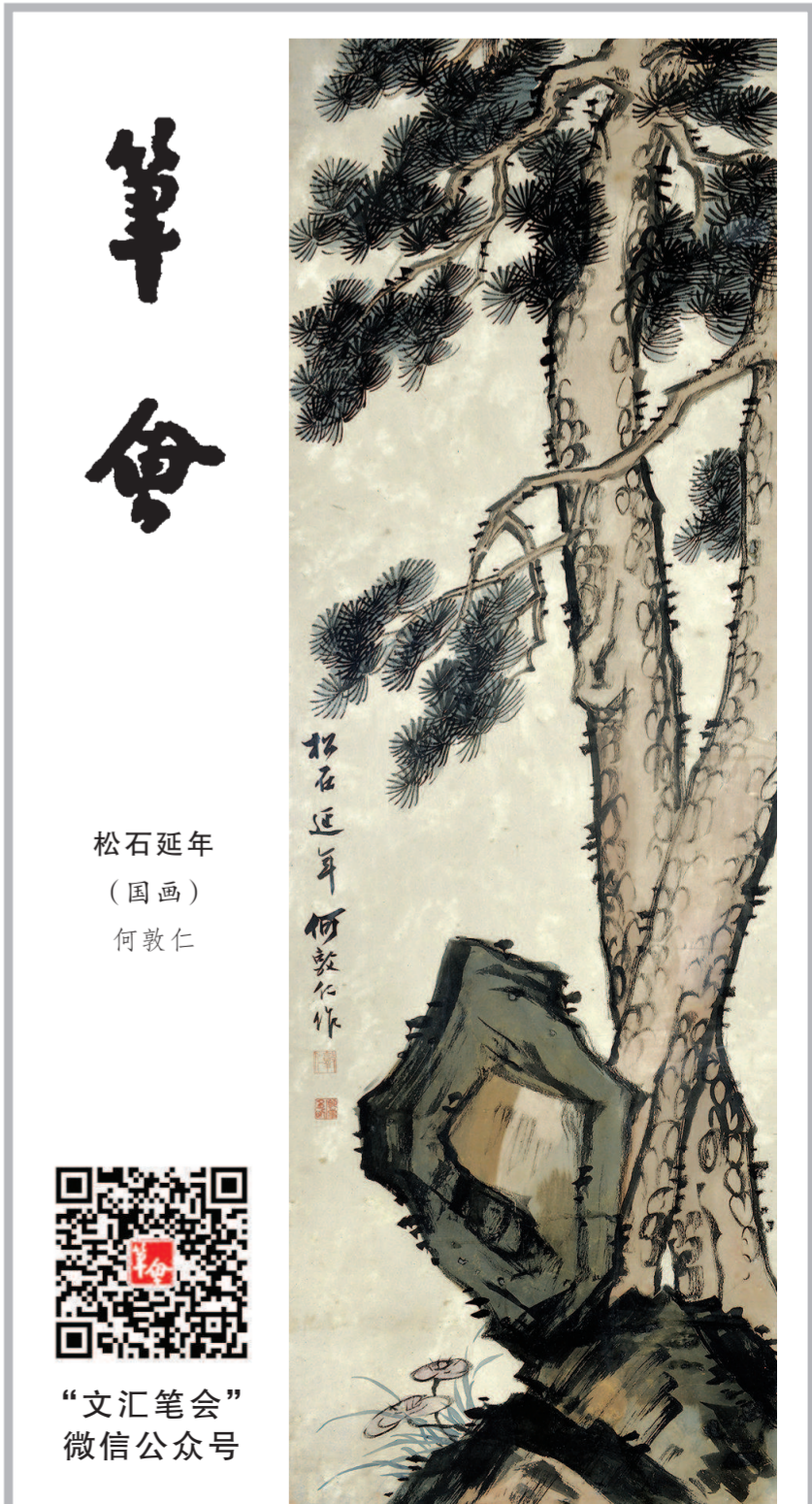
明之嗜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缚耳。

诗要重意重比兴，很明显，吴乔是扬唐，抑宋，斥明。

古代读书人不断比较唐宋诗，现代读书人也在比较。

除了初唐中唐诗，顾随先生大都看不上，干脆给它们都开出了病危通知单：晚唐诗，肺病一期；两宋，二期；两宋以后，肺病三期，就等抬埋。（叶嘉莹等记录的《顾随讲昭明文选》）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按顾随的说法，这些进入病态的诗中没有“事”，这个“事”就是真正地接地气有现实生活的内容。中国诗要复活是在技术外，要有“事”的创作，有“事”才能谈到创作。



松石延年（国画）何敦仁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